

# 非对称权力之下：晚清的中英语言接触历程与文化保持政策

尹红娇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000

**【摘要】**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语言不仅是双方沟通的媒介，也承载并传递特定的思想与文化立场。晚清时期，伴随着中国国门的被动或主动开放，语言更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和自身文化的保护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始，清廷面对外语人才的匮乏、忠诚度不足等问题，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翻译人员仍旧处于边缘地位。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不得不在更广泛的层面与西方进行语言接触，包括但不限于外交谈判、新式教育推广、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面对这种日益加深的语言接触，清政府在被动应对的同时，也展现出一定的主动意识，尤其试图保持清廷的文化正统性，主动对中英语言接触进行制度化改革。本文从晚清中英语言接触的发展历程出发，在清廷于此过程中的“文化保持”视角下，探讨清政府如何在日常道德教化、教育制度控制和西学翻译过滤等措施中，试图保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并对其历史意义与局限进行评估。

**【关键词】**晚清；中英语言接触；文化保持政策

19世纪中叶，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被迫打开大门，西方势力迅速涌入，中国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全面暴露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在这一背景下，中英之间的官方语言接触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早期象征性的礼仪交往，而逐步深入至日常外交、教育、通商、传教与出版等多个领域。语言在这种非对称权力结构中，不仅仅是沟通工具，更成为西方文化话语权得以扩展的关键媒介，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属性。面对英语带来的西方文明的强势输入，中国原有的文化结构面临深刻挑战。清政府在语言接触中所展现出来的态度颇为复杂。一方面，为了满足外交与实用需求，其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翻译官、翻译西方书籍、引进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它又有意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制定教育课程、强调翻译西学过程中的文化过滤功能等方式，主动守护自身原有的文化秩序。与其说清廷是在“中体西用”的观念中被动固守，不如说它是在权力非对称的语言接触中主动采取了一套具有策略性的文化保持政策。本文正是想从这一视角出发，探讨晚清政府在中英语言接触中的文化应对政策。

## 一、晚清中英语言接触的演进历程

鸦片战争以前，中英之间的语言接触极为有限，清廷普遍忽视语言在中外交流中的作用，翻译事务多由“通事”草草承担，语言权力长期被外方掌控。战争失败带来的外交冲击迫使清政府逐步认识到语言在谈判、条约签署中的关键作用，翻译人员由边缘角色转向关系国运的重要工具。同治、光绪年间，清廷开始在制度层面推动语言建设，设立总理衙门、创办同文馆与译书局，并派遣大批学生赴欧美留学，试图在语言主权方面有所作为。晚清中英语言接触的历程，既是一个从忽视到觉醒，最终制度化的转变过程，也深刻反映了非对称权力格局下，清廷在语言治理与文化保护中的复杂应对。

### （一）处于边缘地带的译员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之间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事实上，早在1787年，英国就已经尝试派遣喀塞卡特（Cathcart）出使中国，可惜其在来华途中就已病死，使团被迫返航。这次失败虽未能引起太多关注，却显示出英国早就开始谋求与清廷建立更直接的官方联系。与此同时，除却这两次官方使节活动，在我国东南沿海，大规模的中英语言接触早已在民间层面展开。

为顺利地进行中外商业贸易，广东一带逐渐形成了一种混合语言——洋泾浜语（Chinese Pidgin English）。这种语言融合了葡萄牙语、英语和广东当地方言，最初被称作“广东英语”（Canton English），广东英语是比较文雅的叫法，实际上多称作“广东番话”<sup>1</sup>。这种混合语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中记载道：马士（Hosea Ballou Morse）认为1715年以后的中国商人学会了一种叫作“洋泾浜英语”的奇异的混合语<sup>2</sup>。不过，这种底层的语言接触和混合语言并未得到清政府的正式认可，使用范围始终局限在沿海商贸上。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官方态度中，学习外语不仅不被鼓励，还被认为是可疑且危险的行为。译员必须是受雇于商行且在官府注册过的华人，如果无视这项规定，最后的结果是诛杀以儆效尤<sup>3</sup>。这种严峻的后果使得清政府之后在真正对外交翻译人员有了迫切需求时，反而陷入了“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

1793年7月25日，马戛尔尼率使团到达天津大沽，恰逢乾隆皇帝即将迎来八十三岁寿辰。在收到使团将来华祝寿的奏报后，乾隆多次发布谕旨，要求地方官员妥善接待：“在其使船过境泊岸时，均应迎送犒劳”<sup>4</sup>。在清代礼制体系中，接待外邦使者的翻译人员主要由继承明代的四夷馆负责安排，其中聚集阿拉伯语、藏语、泰语和缅甸语人才。理论上，四夷馆官员要承担起为使团提供翻译的任务，但实际上，清廷与外国交往中的翻译工作，默认由派遣使团的外邦负责<sup>5</sup>。此次贺寿也不例外，中方没有在找寻翻译上费心思，只安排了在京的葡萄牙传教士索德超（Joseph Bernard d'Almendia）作为翻译接待人员。可惜索德超只懂得拉丁语，并且当时英葡在全球贸易中又长期存在竞争关系，而索德超又恰巧是葡萄牙人身份，因此使团人员在马戛尔尼的授意下，皆装作不懂拉丁语，拒绝了这位传教士的服务。最终，英方将自带的华裔翻译人员李自标推举为皇帝与使团正式会谈中的译者<sup>6</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语言接触过程中，无论是使团与乾隆之间的口头会谈，还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William Frederick）致乾隆的国书中文版，翻译主导权都掌握在英人手中，清廷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译人李自标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翻译行为中也带有鲜明的个人目的——在口头转述英方请求的时候，甚至私自加上了一条允许基督徒在华传教的要求<sup>7</sup>。不通英文且无自己译员的清廷完全被蒙在鼓里，语言不再是中立的沟通工具，反而成了为利益博弈的工具。

1 周振鹤：《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2页。

2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vol. 1, p. 66.

3 Macartney Cornell, "Edicts communicated by Thomas Fitzhugh," MS DS116 vol. 11, QL20/3/25.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序言，第3页。

5 沈艾娣著，赵妍杰译：《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台北：时报文化，2024年，第155页。

6 王宏志：《翻译与近代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

7 沈艾娣著，赵妍杰译：《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第188页。

更深层面上，这次使华事件里，清廷与英方对彼此行为的理解可以说是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马戛尔尼勋爵带来的是一份充满殖民主义侵略色彩的“外交请求书”，希望中国开放港口、划出自留地以供英商使用、减免关税以及给予英国商人便利等特权。但清廷却把此次访问看作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使团被中国皇帝体面地接见，但皇帝在之后拒绝其所有的外交要求。乾隆事后甚至给了使团“小丑可笑”的评价<sup>1</sup>，这种落差来源于两个国家文化认知上的错位。

其实，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已从此事中感受到了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在此次访问前后，他多次要求沿海各省官员提高警惕，强调各省都要宣传清廷政策，使民众“各安生业”，防止中外人员相互勾结。但是这个认识非常有限，没有推动官方对于语言资源的重视。

综上所述，这次乾隆时期中英双方的首次官方接触，暴露了清政府在文化认知、语言准备上的全面被动，双方之间的误解加深，并预示了清政府在之后中英语言接触历程中会面临巨大挑战。

## （二）被动应对中的觉醒

鸦片战争之前，中英之间的语言接触基本上是间接进行的，主要通过懂得洋泾浜英语的中国通事来沟通交流，而中国官员将洋泾浜语看作“夷语”，将学习外语视作恶行，还严厉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中文。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洪任辉（James Flint）事件<sup>2</sup>中，清廷就以“始则教授夷人读书，图骗财物，继则主谋唆讼，代作控词”的罪名处死了刘亚匾<sup>3</sup>。因此，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官员对英人几乎一无所知，甚至无法明确理解英人发动战争的真实意图。与之相对的是，英人总结马戛尔尼使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可靠的译员。所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后，不仅系统地学习汉语，还在东印度公司内部开办中文班，培养信任的翻译，将文书翻译权牢牢控制在英方手中。可以看到，之后的中英语言接触文本，例如鸦片战争中签订的中英两个文本，都是英人一手炮制的<sup>4</sup>。王宏志也认为，自马戛尔尼使华这一中英外交事件开始，中英之间的传译模式就开了一个先例——由英方提供为双方传译的译员<sup>5</sup>。

鸦片战争前夜，林则徐奉命担任钦差大臣，赴广州解决鸦片贸易问题。鸦片是英商为打开中国市场的商品，所以林则徐随身携带两名英文翻译——袁德辉和亚孟。可以看出，林则徐对自己从北京带来的翻译并不信任，加之北京官话与广东的粤语差异较大，且南方是英语学习的先发地，英语注音也大多以南方方言为主<sup>6</sup>，所以林则徐一到广州就招募当地的翻译，组成了第一个官方的英文翻译小组<sup>7</sup>。

1 沈艾娣著，赵妍杰译：《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第188页。

2 洪任辉事件：洪任辉（James Flint）是18世纪的一名英国商人和外交家，曾在广州学习中文，是英国第一个中文翻译。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洪任辉前往宁波贸易。自此，东印度公司增加了宁波的贸易量并导致广州港大受影响。朝廷因此将浙江海关的关税提高一倍。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洪任辉进京告御状，通过行贿将一纸诉状告到乾隆皇帝，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保护洋商正常贸易。这件事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中国相关人等受到惩罚，洪任辉被拘押于澳门前山寨，并在期满后驱逐回国。清廷将广州作为唯一口岸的力度加强，颁布《防夷五事》，限制外商活动。洪任辉事件也成为清政府彻底实行独口贸易的标志。

3 [美]威廉·C亨特（William C. Hunter）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页。

4 王宏志：《翻译与近代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7页。

5 王宏志：《翻译史研究 第一辑（201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6 周振鹤：《逸言殊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5页。

7 [意]马西尼（Federico Masini）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韩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显然林则徐认识到了“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sup>1</sup>的重要性，所以积极组织翻译小组和翻译西方书籍，甚至还想要去澳门秘密侦察，寻求情报，毕竟“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最多”，所以尤其应该“密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sup>2</sup>但可惜林则徐招募的翻译能力有限。首先，林则徐从北京带来的翻译袁德辉的履历为，曾在马来西亚天主教会学校学习拉丁文，后于英华书院学过两年英文，1892年在北京理藩院当了拉丁文翻译。尽管有部分文献称其熟悉官话和拉丁文<sup>3</sup>，也有资料指出其英文水平平平，在理藩院的主要工作为拉丁文翻译，实际上和英语没有关系<sup>4</sup>。1839年随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后，他一直被认作中方的首席翻译，因为在林则徐的翻译小组中，他是唯一一位有官职的译员。但是他的英文水平确实说不上好，他曾将林则徐为重开贸易要求英船具结入港的示谕翻译得不知所云，全篇甚至没有一个标点符号<sup>5</sup>。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也曾批评袁德辉“只能理解最简单粗浅的一些大意而已”<sup>6</sup>。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曾经把一份英文文件呈给林则徐，但最后被全文返回了，原因就是林则徐的翻译并不能理解其中的内容<sup>7</sup>。

林则徐招募译员的目的是“知夷以制夷”，但是奈何译员能力有限，搜集到的情报也有误，也不怪林则徐得出英兵“浑身裹紧，腰腿直扑，一跌不能复起”<sup>8</sup>的结论。甚至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他还描述英人：“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sup>9</sup>战前情报如此荒谬有误，难怪清兵在战争中溃败不已。

随着英军发起武力进攻，道光皇帝革决定职查办林则徐，命琦善赴广州与英军进行谈判。琦善在广州期间，仅与英方代表有过两次会面，其余全部通过书面进行谈判，因而翻译传话的“通事”鲍鹏成为这次中英语言接触中的核心人物。鲍鹏原名鲍聪，原为英美商馆的买办，精通洋泾浜英语。他是广东香山人，后因官府严查贩卖鸦片一事逃亡山东，改名鲍鹏<sup>10</sup>。琦善在接到要去广东与英国人进行谈判的旨意之后，特带通晓英语的鲍鹏同往。

在谈判期间，琦善对鲍鹏极其信任，不仅让其单独传话，还赋予他决策权。例如在和英人讨论赔偿鸦片价款时，英方要求赔偿两千万元，而鲍鹏“察其势不能已，作为己意，私询以三百万元数，旋

1 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65页。

2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第174页。

3 William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85, pp.260-261.

4 S.Wells Williams: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By E. C. Bridgman, ” Part 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no.3, (March 1842), p. 160.

5 “Great Imperial Commissioner’s Governor’s of Two Kwang Province Lieutenant Governor’s of Canton. Earnest Proclamation to Foreigners again Issued”,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 3 (July 1839), pp. 167-168.

6 Samuel W. Williams: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by E. C. Bridgma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1, no.3, (March 1842), p. 160.

7 “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2, (June 1839), p. 77.

8 林则徐：《林则徐全集·第5册·文录》，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14页。

9 林则徐：《林则徐全集·第3册·奏折》，第440页。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睿亲王仁寿等奏为会同审拟鲍鹏私充英人买办案由折》（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原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第56页。

复加四百万。”<sup>1</sup> 琦善的这种“秘密外交”模式，严重依赖通事，缺乏制度保障。外交译员本应具备强政治可靠性，而鲍鹏显然不符合这一标准。可以看出，任用鲍鹏也是琦善在当时形势下一个被逼无奈的举措，只因可靠、业务能力强的翻译人员甚至都没有。

广州谈判结束后，鲍鹏被以“前赴夷船传话……经王大臣等拟照勾结外国例加等发遣”的罪名发配伊犁为奴，琦善被革职抄家。清政府非但未有反思翻译制度的缺失，反而干脆放弃使用自家通事，转而全盘依赖外方译员<sup>2</sup>。接替琦善的耆英和伊里布都再没有过固定的译员，间或中间有过通事进行传话，他们却也完全不懂英文。在正式签署《南京条约》时，中方更没有派遣任何翻译出席，就连《南京条约》条文的草拟和确定，也是英方一力承担的。中文文本则是由马礼逊根据英文原文翻译出来，而中国代表——耆英所做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条约抄缮呈览<sup>3</sup>。甚至还需要英方去翻译每一条条约，并向其宣读和解释，以便他们真的理解条文的内容和意义。后来的《虎门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谈判，也都是如此，中国完全把合约条文的书写权和解释权交给了敌人。

在这种权力失衡的情况下，中英两个版本内容存在许多不对等的地方，英方屡屡在条约中玩文字游戏。例如《南京条约》中，关于割让香港岛的内容，英文版写道：“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cedes to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the Island of Hong Kong……”，而中文对应内容则为“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本来“cede”意为“割让”，但在中文版中被弱化为“给予”，从而掩盖了清政府被迫丧失领土主权的事实<sup>4</sup>。

而英方得到了条款书写的主动权之后，并没有就此满足。他们认为中西之间语言接触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条约的中英文版本不对应问题都不能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并且双方在具体条款认知上仍旧存在着差异，这对于之后英人依照条约索取权益有着莫大的威胁。所以，英方在1858年的《天津条约》中又加入条款：

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字详细校对无讹，亦照此例。<sup>5</sup>

这一条款不仅确立了英文文本的最终解释权，也对中国提出了“必须培养英文人才”的硬性要求。自此，中国开始设立同文馆、派遣留学生，掀起学习西方语言与文化的浪潮。在这一过程中，部分人士奉行文化保持政策，希望在中英语言接触中维持中华文化主体性。

### （三）制度化改革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英语言接触的频次显著上升。清政府在长期被动应对的基础上，也逐渐意识到掌握语言和文化主动权的必要性，开始尝试以制度化的方式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引进西方科技、制度和文化。1861年，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统筹外交事务，该

1 季压西，陈伟民著：《中国近代通事》，北京：学苑出版社，第173页。

2 季压西，陈伟民著：《中国近代通事》，第186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和约已定铃用关防并将和约抄缮呈览折·附件：和约十三条》《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第158页。

4 杨明星，张琰：《中英外交翻译中“政治等效”与话语平等辩证关系分析——从马夏尔尼使华到共建“一带一路”（1792-2019）》，上海翻译，2020年第5期，第26页。

5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02页。

衙门下设京师同文馆，作为专门的外语人才培养机构。同文馆初设时以英语为主要课程之一，并聘请外国教师授课，试图通过系统教育弥补翻译人才短缺问题。与此同时，同文馆在学习外文之余，还组织师生共同翻译西书。1867年，馆内正式成立“译书局”，组织师生合译西方著作。

在办学过程中，清廷也逐步认识到“闭门造车”的局限性。例如，学生即便书面英文不错，在与洋人进行口语交流的时候却表现生疏。光绪十六年（1890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志锐在给光绪皇帝上书时就提到过这个问题：“出洋大臣奏带同文馆学生充当翻译者，卒不多见，余谓学生文字虽精，语言不熟，每有临时传述而洋人茫然不解者。奴才曾经试验，令其与洋人对面交谈，诚有不解之时。推原其故，盖学生专习文字，一旦托之言语，只能按书翻译，多有与土音方言不合之处。”<sup>1</sup>清廷也认识到，仅仅依赖馆内的课堂教学，学生难以真正掌握洋文、洋学。于是，清政府开始组织官费留学项目，如1872年幼童留美和1905年的庚款留美计划，虽然这些官方留学活动体现了清政府以制度性的方式接触西方社会的尝试日趋先进，但同样也渗透着西方殖民者的“文化帝国主义”<sup>2</sup>逻辑。

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这一阶段的中英接触中，清政府表现出较前期更强的主动性，但其主动性更多源于外交与军事压力下的策略调整，而非完全出于文化主体的自主意识，这就决定了中国学习西方纯出于功利观点<sup>3</sup>。换言之，这种看似主动的文化接触，根本推动力在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称，这种在语言接触上的非对称性可以归纳为殖民国家奉行的“文化帝国主义”。结合萨伊德的“东方主义”<sup>4</sup>，可以看出西方不仅塑造了对“东方”的想象，还通过语言、法律、教育等手段将自身文化强行输入清廷的制度内部。正如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斯（Edmund James）给美国总统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备忘录中写的那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sup>5</sup>所以庚款返华支持留学的“善意”背后还体现着文化霸权的深层逻辑，但这往往会为表面上的“交流”和“现代化”所覆盖。

从一开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就并非完全出自清政府本意。随着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外交事务日益繁多，西方列强对清政府传统的“理藩院”体制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朝贡体制不适合平等外交。外国公使要求清廷设立专门机构进行平等对话。在此压力之下，清廷改革外交体系，设立总理衙门。然而，总理衙门下设的海关总税务司和同文馆被外国人长期把持。例如，晚清历任总税务司皆为英国人，同文馆则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主导，且达25年之久。这种安排下的制度加强了西方知识体系的输入，使得中方在语言接触的历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影响。

例如，自1869年开始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本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被外国传教委员会任命到中国。丁韪良早在为清政府服务之前，就已经受雇于美国国务卿威廉（William

1 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1页。

2 [英]汤林森（John Tomlinson）著，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汤林森在其中言：“‘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民族国家都有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民族国家通过自己的语言、伦理、习俗、精神价值的认同，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维护国家的统一。”

3 余英时著，沈志佳编：《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第33页。

4 引自[美]萨伊德（Edward W. Said）著，王宇根译：《东方学》（“ORIENTALIS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绪论第1页：“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斯、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

5 引自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校长詹姆斯（EDMUND J. JAMES）写给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一封信的内容，现在清华大学校史馆正门墙上可见。

B.)，并且在中美多次外交谈判当中担任翻译<sup>1</sup>。丁韪良在担任同文馆总教习时，翻译了美国法学家惠顿(Henry Wheaton)的《国家法要论》(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中文译为《万国公法》，惠顿的这本书在西方被认为是更具现代性与权威性的国际法文本。但其实，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美国律师和外交官，本书是美国人对国家法的理解，作者在书中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偏袒。因此，早在1855年，美国国务院就想把惠顿的书寄给美国驻华专员<sup>2</sup>。英国外交官卜鲁斯(Frederick Bruc)得知丁韪良要译介此书时曾陈：“The work would do good,……by showing the Chinese that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have taoIi [principles] by which they are guided, and that force is not their only law.”(这部作品将使中国人意识到，西方各国并非唯武力是从，而是依据一定的道理(原则)行事。)<sup>3</sup>这番话不仅体现出国际法律具备西方的意识形态，也凸显了西方借助法律条文对自身的侵略行为进行道德正当化的策略。就连丁韪良自己都指出，清朝的法律虽然被译成外语，但是中国也从未尝试让西方国家接受并实施这些法律。这也能揭示出，这场看似双向的中英语言接触，实际上仍是在西方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进行的“单向”的输入与接受。

## 二、文化保持政策

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中国文化必须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陈寅恪所谓“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目标<sup>4</sup>。晚清政府在面对中英语言接触中引发的贸易摩擦、宗教传播和殖民统治等问题时，虽未明确地提出系统的文化保持政策，却在实际应对中体现了文化自守的深层意图。无论是在日常的道德教化、官方的语言教育、制度建设还是民间文化输入等中，清政府都将外语视为一种“工具性”技能，借此以“用其术而不失其道”的方式，抵抗外来文化的深度渗透，维持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

### (一) 日常道德教化

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一直以来萦绕在历代统治者心上的恐惧莫过于“内敌”与“外敌”联合推翻统治，所以清统治者非常重视意识形态控制。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清康熙年间，统治者沿袭明代皇帝朱元璋的“六条圣谕”，建立了朔、望宣讲圣谕的制度。雍正二年，“六条圣谕”扩展成了万言的《圣谕广训》，至嘉庆十九年还被列为考试内容<sup>5</sup>。显示出其从教化文本向国家意识形态教材的转变。

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湘军首领王鑫主张“每三五日一次《圣谕广训》”，这一要求远超“朔、望宣讲”。根据周振鹤的研究，《圣谕广训》在太平天国之时成为政府教育百姓的唯一思想资源<sup>6</sup>，进一步表明其已转化为一种政治动员工具。因此在之后，每当社会变动之时，《圣谕广训》就被当作一种思想武器来运用。在西学输入和语言接触制度化的晚清阶段，官方仍坚持在新式

1 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14.

2 *Diplomatic Despatches, China Despatches,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hereafter NARA)*, vol. 15, Reed to Cass, December 31, 1857.

3 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20.

4 余英时著，沈志佳编：《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序言，第II页。

5 《清实录》(第三一册)《仁宗实录》(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三00：第1121页。

6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629页。

学堂推行圣谕宣讲：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中设置了英语作为学习科目，但同时章程的第七章第一节也规定了“每月朔由总教习传集学生在礼堂敬谨宣读《圣谕广训》”<sup>1</sup>。丁韪良也曾回忆，在同文馆时期，“本来每半个月就要宣讲一次《广训》，现在这种仪式已经将近消失，很少宣讲了，因而不再受到人们的注意。”<sup>2</sup>这次回忆是他在1900年写于纽约的。自1862年，丁韪良就担任同文馆教习，1869年正式提名为总教习，直到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而光绪皇帝在1899年下诏内阁，要求“京外书院、学堂皆以讲明《圣谕广训》为根本”<sup>3</sup>，可见在190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同文馆都有半个月宣讲一次圣谕的规定。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引入西学西言的教育场所，清政府依旧拉起道德教育的防线，试图维系本土文化主体的稳定。

但实际情况是，频繁的宣讲使得圣谕早就失去了本来的功效，百姓和学生对此反感不已。所以，地方官员只能变更宣讲的方式，以完成宣讲任务。例如郭沫若就曾在他的《少年时代》中记载，宣讲圣谕的先生会把宣讲和说书结合起来，以提升听众兴趣，借此留住百姓<sup>4</sup>。可见圣谕即便再难以深入人心，仍具有维护稳定的象征意义。

不仅国内大小学堂如此情况，清廷在海外留学制度中更是严格执行文化保持的策略。1872年，在容闳的积极推动下，曾国藩、李鸿章订立的《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被准奏，但其中明确规定选派幼童时要通过中学考核，赴美后也要先在“中学院肄业”，学习《孝经》、小学、五经等儒学经典<sup>5</sup>，再到“军政船政两院肄习”，如此才能“不忘本国规矩”<sup>6</sup>。此外，留学期间，“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监督都要传集学生宣讲圣谕广训，以示“尊君亲上之义”，防止学生“囿于异学”<sup>7</sup>。

但即便措施如此严密，也依旧改变不了留美学生“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sup>8</sup>。这引起了留美正监督陈兰彬的恐慌。他本为翰林，在刑部任主事二十余年，从未出国留洋过，是最固守传统礼教的人物。在美国时，他要求学生每天遥给中国皇帝叩头，拜读《圣谕广训》《孝经》《国朝律例》等书，衣着穿戴必须符合清朝礼制，甚至发式上依然要拖着辫子。这一切无不体现出清政府试图以仪式化的方式加强文化认同，来抵御被异国文化同化的风险。留学局谕告中所强调的：“但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是以功夫要上紧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若任意将规矩变更，将来到家，如何处群合众？……是以谕示尔等，要将前后思量，立定主义。究竟在外国日少，居中国日长，莫待彼时将来不改，后悔无及也。”<sup>9</sup>

综上所述，从《圣谕广训》的宣讲制度到留学中的道德教育与行为规范，晚清政府即便在制度层面上接纳了外语和西学，也始终守护着文化底线。其通过各种形式上的道德教化，在抵御语言文化渗透的同时，努力维持着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

1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辑》，张百熙撰：《钦定学堂章程》，上海：文海出版社，第71页。

2 [美]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清实录》（第五七册），《德宗实录》（六），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卷四四九，第932页。

4 雷风行：《郭沫若的少年时代》，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

5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63-166页。

6 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895页。

7 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871页。

8 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887页。

9 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895-896页。

## （二）制度教育控制

在日常道德教化之外，清政府也非常重视通过制度化的教育体系加强对文化本位的保护，以抵御西方文化输入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其中，同文馆作为清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外语教育机构，课程设置体现出明显的文化保护倾向。尽管设立的初心是为了培养通晓外语的外交和翻译人才，但具体的制度和课程安排始终坚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同文馆学制年限为八年，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逐步加上数理化等西方科学知识，但是也强调：“以上课程，惟汉文熟谙、资质聪慧者可期成就。”<sup>1</sup>学习英文，反而对汉文有着超乎寻常的高标准，足见清政府对传统文化素养的高度重视。所以，虽然汉文经学未列入课程中，但学生每天要拿出半天时间用于学习汉文，一般是在每日午前由举人、贡生出身的汉教习教授经史经文等传统课程。对于那些汉文功课名列前茅者，朝廷甚至给予白银奖励。这种奖惩分明的机制意在引导学生强化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依附。

同文馆名义上是为了推动西学教育而设，但中西课程的设置是相对割裂的。在教授传统中学课程时，依旧延续“遇庙讳御名，自应一律敬避恭代”的规训，而西学教育不会注重这么多的规矩。据丁韪良回忆，在他的课堂上，他从不回避和学生们讨论宗教问题，还要求教习们不要一看到宗教问题的段落就跳过去不读，这在形式上打破了清政府禁止在同文馆课堂上讲授宗教的规定。但是总的来说，学生们对于宗教问题依旧采取审慎的态度，担心接触过多宗教文化将会受到社会歧视，甚至令仕途受阻<sup>2</sup>。事实上，这种担心正是源于清廷掌控学生的手段——考试与官位授予挂钩。根据规定，同文馆三年一大考，成绩优异者可以授七、八、九品等翻译官，但是劣者就要降革或者返回原籍，其内部运行逻辑与科举制度异曲同工。这种教育制度化安排，使得学生在接受西学的同时，不得不始终以中学为主，以儒家价值体系掌控其发展方向。

这一制度逻辑在晚清同时代士人吴汝纶的教育主张和实践中得到了回应，吴氏作为曾国藩门下“四大弟子”之一，和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系密切，也身体力行地赞同曾、李主张的“中体西用”的教育理念。甲午战后，吴汝纶奉清廷之名，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在此期间，他深切关注东西方文化冲突和教育理念差异的问题，并与日本著名哲学家井上哲次郎讨论新学与旧学的关系问题：“贵国前辈，似皆以汉文为根底，后进之士，则吐弃汉学，一奉西文。究竟人才，后进与前辈风气孰胜？”井上哲次郎则指出“吾国前辈之奉西学者，以汉文为根底，加之以西学，是以多有为之士。”<sup>3</sup>吴汝纶对此回复深以为然，并从中提炼出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应该坚持的立场：“得欧美富强之具，而以吾圣哲之精神驱使之，此为最上之治法。”<sup>4</sup>他明确认识到“东方俗尚不能尽用西法。而敝国六经传记所遗留之伦理学，实立国不刊之典。”<sup>5</sup>中国通过六经传承下来的伦理哲学凌驾于世界各国之上，这样的思想高度契合清政府在教育制度中对于儒家文化的维护态度。据他分析，中国如今正在遭受西方的文化摧残，欧美各国凭借自身技术武力上的优势，“诟病吾国文学，以为无用”<sup>6</sup>。

在此情形下，从日本回来的吴汝纶身体力行地将其理念付诸教育实践，在家乡创立了桐城中学，这

1 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86页。

2 [美]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第220页。

3 吴汝纶著，李长林校点：《吴汝纶东游丛录》，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23页。

4 大成故纸堆，近代史料全文数据库，《教育世界》，第525页。

5 同上，第522页。

6 同上。

也是晚清以来最早创办的新式学堂之一。他根据日本的教育方针，推崇德育先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其身上体现出的文化自信和对西方文化入侵的警惕，反映了晚清士人对本土文化保持的深刻自觉。无论是以同文馆为代表的官方教育制度，还是以吴汝纶所代表的开明士人的教育理念，都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中英语言接触背景之下，清政府在文化保持上采取的重要制度教育手段。

### （三）西学输入的过滤

在晚清西学大量集中输入的过程中，清廷不仅在官方学堂和教育制度等层面设置保护屏障，更通过翻译的筛选与文化选择功能，对外来知识加以主动过滤和本土化整合。这种过滤机制，既体现在政府主持之下的官方翻译活动上，也部分表现在个人译者翻译活动中，反映出晚清社会整体上下对本土文化的保持意识。著名翻译家孔慧仪也提出，或许在中国漫长的翻译史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本土文化是如何有选择地把外来文化知识引上了适合中国本土化发展的轨道的，更要关注的是：“翻译是否能造成文化影响，又或是如何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其实并不在于语言转换的过程，而完全视其主体文化如何制约，又如何接受这个过程的产物。”<sup>1</sup>这与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翻译、重写以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提出的“赞助人”理论不谋而合，他认为控制整个社会文学系统的运行不仅受“文学专业人士”的影响，更受代表着权威和社会意识形态力量的“赞助人”的控制。<sup>2</sup>

晚清的林则徐更是第一位“赞助人”代表。林则徐奉命到广州禁烟期间，敏锐地意识到了了解西方主导下的国际政治法律思想对于外交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林则徐初到广州，就设立译馆，组成翻译班子。除了任用自己的翻译人员翻译西学书籍之外，林则徐还与当地的外国传教士积极接触。从当时美国医学传教士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在眼科医院的报告中可以得知，林则徐为了与其进行接触，主动在其眼科医院挂号，真正的意图是请其翻译西方法律名著——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的《万国法》（*La Loi des Nations*）中关于战争以及之后的封锁、禁运措施的三段内容。林则徐根据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法，知道自己有权宣布鸦片走私是违法的，并且可以要求销毁鸦片。刘禾（Lydia H. Liu）分析：“In other words, Lin treated international law not as the universal truth but as a mode of persuasion that would enable him to argue against the harmful effects of the opium trade in a language he thought the British could understand.”（换句话说，林则徐没有把国际法当作普遍真理，而是当作一种说服方式，使他能够用一种他认为英国人能理解的语言来反驳鸦片贸易的有害影响。）<sup>3</sup>这既体现出他个人以理驳理，借法反抗的灵活策略，又体现了林则徐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赞助人身份所选择的翻译态度。

除了林则徐主导的官方翻译活动，晚清民间对西学的输入也有着各自自觉的文化过滤意识。晚清首部翻译小说《听夕闲谈》，于1873年刊于近代第一个文艺杂志《瀛寰琐记》第3至28卷上，由署名“蠡勺居士少”，又称“藜床卧读生”的匿名人士译出，译者身份至今未明。《听夕闲谈》全书3卷，55节，通

1 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5页。

2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227.

3 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18-119.

过贵族的私生子康吉的人生经历，展现了英法上流社会的堕落风气和道德颓唐。<sup>1</sup>而译者翻译的意图正是“启发良心、惩创逸志”，通过描绘西方社会的阴暗面，警示中国读者珍惜中国儒家伦理治理之下社会的纯洁性。

上面提到除了官方的翻译活动之外，个人的翻译活动也需要赞助人的支持，林则徐作为官方翻译活动的赞助人，其背后站的是清廷。而晚清时期另一个著名的赞助人是吴汝纶，吴汝纶赞助的是清末重要的翻译家之一严复。1897年严复翻译了赫胥黎（T. H. Huxley）的《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中的《序论》和《本论》，译名为《天演论》。吴汝纶是晚清开明派的代表，严复对其是十分尊崇的，他认为“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淮阴郭侍郎（郭嵩焘）后，吴京卿一人而已”。<sup>2</sup>所以严复每译一文都要送给吴汝纶先阅，请吴氏给他作序。<sup>3</sup>而上文也曾提到过吴汝纶认为中西学融合过程中，始终应该坚持中学的主体地位。所以或许受吴汝纶影响，严复在《天演论》中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来论证改革的重要性，强调强国的必要性，同时借助中国古典话语加以阐释，如《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来引导读者将进化论理解为符合中华传统哲学的自然演进思想。

此外，严复并未全面引介原作中可能引发意识形态冲突的部分内容，对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中激进的民主主张、个人主义倾向，严复在翻译时往往有所取舍，强调“权利”应与“责任”并重，试图避免这些思想直接冲击清朝既有的宗法制度与君主权威。他更关注如何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引导中国社会在维系文化正统的同时实现自我更新。这种“适中转译”的策略，实则是对文化主体性的一种积极捍卫。

综上所述，从林则徐、龔勺居士少、严复等官方与民间译者的实践可以看出，晚清时期西学的引入绝非被动接收，而是建立在清廷意识形态和文化主权观念指导下的一种“选择性”融合与改写。通过精心挑选的翻译内容、有意引导的诠释方向以及对西方思想的重构，晚清中国构建出一套带有文化过滤机制的翻译系统，使西学在输入的同时，不仅未动摇中华文化的根基，反而服务于国家自主变革的需求。

### 三、结语

综观晚清中英语言接触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到这一过程不仅是开启国门、融入世界的必然结果，更是在非对称权力格局下中方艰难调适、自主谋变的过程。语言作为沟通媒介，在此时早已超越了工具属性，成了不同权力博弈之下意识形态渗透的关键。清政府虽然在鸦片战争前期表现出对翻译的轻视与相应的制度建设的滞后，但随着列强政治、武力和文化等方面的压力日益加剧，逐渐在道德教化、教育体制与翻译实践等层面构建起一套具有文化防御性质的“文化保持政策”。

无论是《圣谕广训》的制度性宣讲、同文馆课程中的经学设置，还是林则徐、严复等人在西学引进过程中表现出的有意识的“文化选择”，都反映出晚清政府与士人在面对文化入侵时，并非被动挨打，而是展现出一种具有战略性的“筛选过滤策略”。尤其是在翻译活动中，通过删减、改写和方向诠释，中国译者在外来话语中重新注入本土意义，体现出对坚守文化主权与保持主体身份的努力。

1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2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第1550页。

3 王棫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群学肄言〉译余赘语》，第126-127页。

然而,这种文化保持策略虽在短期内缓解了文化冲击的紧张,也强化了本土文化的延续性,但其根本的局限在于始终未能跳出“中体西用”思想,仍将西学作为器物层面的补充,而非作为可能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资源来加以整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语言接触所能带来的社会结构性转变。

在今天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并存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晚清中英语言接触的历程,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近代中国文化自保的经验,也为当代中国在跨文化交流中如何平衡本土立场与全球视野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借鉴。

### 参考文献

- [1] 周振鹤. 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 [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5): 2.
- [2] Morse H B.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66.
- [3] Cornell M. Edicts communicated by Thomas Fitzhugh[Z]. Manuscript DS116, 11, QL20/3/25.
-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 [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3.
- [5] 沈艾娣. 翻译的危险: 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 [M]. 赵妍杰, 译. 台北: 时报文化, 2024.
- [6] 王宏志. 翻译与近代中国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 [7] 亨特 W C. 广州“番鬼录” [M]. 冯树铁,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44.
- [8] 王宏志. 翻译史研究: 第一辑(2011)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11.
- [9] 周振鹤. 逸言殊语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05.
- [10] 马西尼 F.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 [M]. 黄河清, 译.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20.
- [11] 林则徐. 林则徐集·奏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765.
- [12] 林则徐. 林则徐书简 [M]. 杨国桢, 编.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174.
- [13] Hunter W C. Bits of Old China[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85: 260-261.
- [14] Williams S W.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J].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2, 11(3): 160.
- [15] Great Imperial Commissioner's Governor's of Two Kwang Province Lieutenant Governor's of Canton. Earnest Proclamation to Foreigners Again Issued[J].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9, 8(3): 167-168.
- [16] 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J].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9, 8(2): 77.
- [17] 林则徐. 林则徐全集 [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1.
-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 [19] 季压西, 陈伟民. 中国近代通事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 [20] 杨明星, 张琰. 中英外交翻译中“政治等效”与话语平等辩证关系分析——从马戛尔尼使

- 华到共建“一带一路”(1792-2019)[J]. 上海翻译, 2020(5): 26.
- [21]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一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102.
- [22] 朱有瓛.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一辑上册[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51.
- [23] 汤林森 J. 文化帝国主义[M]. 冯建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24] 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M]. 沈志佳, 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25] 萨义德 E W.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1.
- [26] James E J. Letter to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Z]. 1906.
- [27] Liu L H.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8]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Diplomatic Despatches, China Despatches[Z]. 1857, 15.
- [29] 清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30] 周振鹤. 圣谕广训: 集解与研究[M]. 顾美华, 点校.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629.
- [31] 张百熙. 钦定学堂章程[A]// 云龙, 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第10辑[M]. 上海: 文海出版社, 71.
- [32] 丁韪良. 花甲忆记: 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M]. 沈弘,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33] 雷风行. 郭沫若的少年时代[M]. 北京: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5.
- [34]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册[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163-166.
- [35] 高时良.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 [36] 吴汝纶. 吴汝纶东游丛录[M]. 李长林, 校点. 长沙: 岳麓书社, 2016: 23.
- [37] 教育世界 [DB/OL]. 大成故纸堆近代史料全文资料库.
- [38] 王宏志. 翻译与创作: 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
- [39]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227.
- [40] 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4.
- [41] 王棫. 严复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Asymmetric Power Relations: The Process of Sino-British Language Contact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Polic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YIN Hongjiao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00, China

**Abstract:** In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tes, language serves not only a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s a carrier of specific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position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China's forced or gradual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language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both China's interac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its own culture. Since the arrival of the Macartney Mission, the Qing court had long faced problem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foreign-language talents and concerns over the loyalty of interpreters. However, no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measures were taken, and translators continued to occupy a marginal position.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compelled to engage in broader linguistic contact with Western countries i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the promotion of modern education, the dispatch of overseas student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works. In response to the deepening linguistic interaction, the Qing government, while largely reacting passively, also demonstrated a certain degree of initiative, particularly in its attempts to preserve the cultural orthodoxy of the Qing court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forms in Sino-British language contac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ino-British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Qing government's "cultural preservation" perspective and explores how it sought to maintain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moral instruction in daily life, contro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electiv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limitations of these strategies are also evaluated.

**Keyword:** Late Qing Dynasty; Sino-British Language Contact; Cultural Preservation Policy

版权所有 © 2025 本文作者和香港科技出版集团。本作品根据知识共享署名国际许可证 (CC BY 4.0) 获得许可。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